

新中国首次国庆纪念活动

□石绍庆

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举行开国大典，毛泽东在北京天安门城楼上宣告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成立。但此时，“10月1日”还没有被明确作为新中国的国庆纪念日，新中国第一次真正意义上的国庆纪念活动则是在1950年。

新中国国庆节的确立

开国大典后，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务院教育部部长、中国民主促进会中央主席马叙伦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已经成立，民国时期确定的“双十”国庆节应该明确废止不再沿用。因此，马叙伦起草了一份《建议十月一日为国庆日》的建议案，准备向即将召开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国委员会提出。

1949年10月9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国委员会在中海勤政殿举行第一次会议。马叙伦因病由许广平转达了关于确定10月1日为国庆日的建议案。随后，中央人民政府秘书长林伯渠发言附议，要求讨论决定。毛泽东也表态支持：“我们应作一提议，向政府建议，由政府决定。”会议一致通过“以十月一日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庆纪念日”的建议案，并作出《请政府明定十月一日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庆日，以代替十月十日的旧国庆日》的决议，送请中央人民政府采纳施行。林伯渠在接受新华社记者采访时表示：“现在全国人民的奋斗，已经获得成功，旧中国已死亡，新中国已诞生，应当有新的国庆日。”

1949年12月2日，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第四次会议通过《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庆日的决议》，认为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国委员会所提建议案是符合历史实际和代表人民意志的，决定加以采纳，并宣告：“自1950年起，即以每年的10月1日，即中华人民共和国宣告成立的伟大的日子，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庆日。”

1949年12月23日，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第十二次政务会议，通过了《全国年节及纪念日放假办法》，规定国庆纪念日作为全体人民的节日，每年的10月1日、10月2日放假两天，共同纪念新中国成立。至此，“10月1日”作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法定节假日最终确立起来。

隆重的国庆节庆祝大会

1950年9月9日，中央人民政府和北京市各机关、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代表51人，举行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庆节筹备会。会议决定于国庆日当天，在天安门广场举行盛大的阅兵典礼和庆祝游行，并推选彭真等14人为筹备委员，组成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庆节筹备委员会，负责领导庆祝国庆节的各项筹备工作。筹备委员会设办公室、秘书处、布置处、宣传部、外宾招待处、指挥部及联络部

7个部门。

为筹备首次国庆纪念活动，天安门前及广场进行了各项修整，将华表进行重新迁移，在广场旗杆四周修筑汉白玉栏杆，玉带河北岸东西两边和电车道南、红墙前两边分别修筑可容纳6000人的看台，玉带河南和原有石板道之间修成石灰砖路。除此之外，还实施了林荫大道路面修筑工程，在电车轨道修铺轨道石，在东单、王府井南口、南池子南口和司法部街北口等路口修筑交通高空岗楼。

9月30日，周恩来总理在政协全国委员会为建国一周年举行的庆祝大会作题为《为巩固和发展人民的胜利而奋斗》的报告，总结了一年来的伟大胜利和国家各项建设的辉煌成绩。

1950年10月1日，新中国第一届国庆节庆祝大会在天安门广场举行。天安门上高悬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徽和毛泽东主席的巨幅画像，东西墙上横挂两幅巨大标语——“中华人民共和国万岁”和“世界人民大团结万岁”，广场南侧两壁红墙飘扬着写有“国庆”两字的红绸和32面红旗。

上午11时，中央人民政府秘书长林伯渠宣布庆祝大会开始，在国歌的军乐声中，齐鸣28响礼炮。庆祝活动首先进行阅兵式，阅兵式由中央人民政府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代理总参谋长聂荣臻任总指挥，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司令朱德检阅了陆军、空军、海军和公安部队，并宣读中国人民解放军总部给全国武装部队和民兵的命令，随后进行武装部队分列式检阅，共历时1小时20分钟。此次阅兵齐集了步兵、炮兵、战车、摩托化步兵和骑兵部队，空军各种飞机在会场上空由东向西飞行受阅。

阅兵式后，中国共产党和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中国民主同盟、中国致公党、九三学社等民主党派分别向毛泽东主席献旗。随后，进行了盛大的游行活动，走在最前面的是少年儿童队，紧接着是大工厂的产业职工、近郊农民、回族群众、机关职工、中等以上学校学生，有组织的工人、店员和其他市民。整个游行队伍行进了3小时25分钟才全部从检阅台前通过，庆祝大会在下午4时25分结束。

全国广泛开展庆祝活动

1950年10月1日出版的《人民日报》，刊载了林伯渠、董必武、陈云等领导同志对一年来中央人民政府在巩固人民民主专政、促进法律建设、开展财政经济工作、文教工作以及工商贸易工作取得的伟大成就，还登载了邓小平、彭德怀、乌兰夫、王震等对一年来西南、西北、内蒙古、新疆等地区工作的总结。

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主席李济深以及马叙伦、张澜、黄炎培、章伯钧等民主党派领导人也纷纷撰文歌颂新中国一年来取得的伟大成绩。作为新中国国庆节建议案的提出者，马叙伦特别强调：“在遥远的‘万里长征’的途程上我们只不过走了最初的几步，还有上万里的路程等待我们向前迈进。我们只有下定决心，更紧密地团结在共产党和毛主席的周围，接受他们的领导，贡献出我们可能贡献的一切力量，才能够完成革命的全部任务，实现革命的最终目标。”

全国各地人民均以兴奋愉快的心情，热烈庆祝新中国第一个国庆节。各省、市先后成立庆祝国庆节筹委会，以盛大的庆祝会、阅兵、游行及其他多种多样的活动，迎接这个伟大节日。

沈阳市举行了盛大的阅兵式和约有20万到30万人参加的庆祝大会，并组织全市各工厂、机关、学校及居民区举行报告会，向各界人民进行爱国主义教育。华东暨上海各界庆祝国庆筹委会着重深入各阶层人民群众中宣传中国人民一年来的成就与经验，使各界人民普遍对未来的生活充满了信心。广州市举行十几万人的庆祝大会及游行，在珠江举行花艇文娛晚会，免费演出三幕大歌剧《解放一周年》招待市民，举行“广州解放周年”大型演奏会。西安市庆祝国庆节筹备委员会通过各种形式，鼓舞人民的劳动热情、增强各民族各阶层人民的团结，反对对帝国主义的侵略、努力建设新中国和新西北。

各地少数民族人民对这一具有伟大意义的节日同样充满喜悦，新疆哈密、宁夏银川、青海西宁和若干边疆地区的城市，都广泛进行宣传活劢，举行火炬游行。西藏康定民族协商会议的藏族和回族代表在国庆前一周分别召开各族各界座谈会，畅谈国庆节的重大意义与人民政府的民族政策。云南宁洱边疆少数民族也赶到昆明参加庆祝国庆大会。

宁死不屈 浩气长存

——济南市“四五”烈士纪念碑碑文敬读

□王巨新

王凤岐，一九一一年生，山东德县人，中共山东省委巡视员。

孙守诚，一九零一年生，山东淄川人，中共青岛市委常委。

孔庆嘉，一九零六年生，山东曹县人，曹县农民武装暴动领导人之一。

任守钧，一九一零年生，山东曹县人，曹县农民武装暴动领导人之一。

赵鸿功，一九零零年生，山东蓬莱人，中共蓬莱党支部书记。

王锡三，一八九零年生，山东长山人。

李华亭，一九零零年生，山东昌乐人。

陈德金，一九零八年生，安徽怀远人。

同期前后被害于此的共产党员还有多人，为了缅怀和发扬烈士精神，一九八八年，共青团槐荫区委在原刑场旧址特立此碑，以永志垂念。

(一)

大革命失败后，国民党军队于1928年5月进入济南，此后国民党势力控制山东，对共产党组织和党员进行疯狂破坏和抓捕。自1928年冬至1931年春，中共山东省委共遭到5次大的破坏，邓恩铭、刘谦初、吴丽实、郭隆真等大批党员干部被捕。邓恩铭等被捕后，国民党反动当局妄图通过长期监禁，摧残其肉体，销蚀其革命意志，动摇其革命信仰。但是，邓恩铭等共产党人，没有被敌人的威逼利诱所吓倒，他们团结起来，成立狱中党组织，同敌人进行了不屈不挠的斗争。其中1929年7月组织的一次越狱，共有18人逃出监狱大门。但由于长期遭受关押甚至严刑毒打，大部分越狱人员身体孱弱，加之省委刚遭破坏，狱外党组织未能派人接应，最终只有6人逃脱。

1931年4月5日凌晨，国民党山东省当局将邓恩铭等22名共产党员从狱中押出，用汽车载往纬八路刑场，枪杀于纬八路东南草地上。其中郭隆真才出监狱大门，因高呼口号，被押回狱内杀害。牺牲的22名烈士，年龄最大的41岁，最小的才20岁，平均年龄28岁。

(二)

“四五”烈士中，有3位曾担任过中共山东省委书记。邓恩铭于1921

年春与王尽美等共同创建济南共产党早期组织，7月与王尽美赴上海参加党的一大。1925年8月任中共山东地方执行委员会书记，1927年8月、11月两次任中共山东省委书记。刘谦初1927年入党，曾专门拜访毛泽东，请他讲述农民运动与中国革命的问题。1929年4月，刘谦初任中共山东省委书记，8月，其在明水车站遭特务抓捕。吴丽实1923年入党，后到哈尔滨工作，为党组织在东北的创建和发展作出重要贡献。1929年冬，吴丽实到山东，任临时省委书记。然而，工作不到两个月，临时省委遭破坏，吴丽实被捕。

郭隆真是“四五”烈士中唯一的女共产党员。1919年9月，郭隆真与周恩来、邓颖超等在天津组建觉悟社，后与周恩来等赴法勤工俭学。1925年回国后，在李大钊主持的北方区委领导下工作。1928年底，受党组织委派到东北从事职工运动。她不知疲倦，忘我工作，被刘少奇评价为“在工作上最积极，在政治上又最正确的大姐”。1930年秋，郭隆真被派到山东工作，曾任省委妇委书记，11月初在青岛被捕。还有党维蓉、雷晋笙、刘晓浦、刘一梦等烈士，他们虽然工作经历各不相同，但都有着对党的忠诚、对人民的热爱和对共产主义事业的追求。

节”，直到被害，也没有泄露党的任何秘密。

学习“四五”烈士视死如归、前仆后继的意志品质。邓恩铭牺牲前，曾写下一首《诀别》诗：“卅一年华转瞬间，壮志未酬奈何天。不惜惟我身先死，后继频频慰九泉。”刘谦初牺牲前，得知党组织正在积极营救，于是给党中央写信说不要进行营救，“我心里很平静，正在加紧读《社会进化史》，争取时日，多懂一些道理。”刘晓浦和刘一梦是叔侄，二人被捕后，家人曾变卖田产，携巨款到济南营救。但刘晓浦说：“不要再花钱了。我和他们是死对头，不是鱼死，就是网破。如果自首才能出去，那是永远也办不到的。”

学习“四五”烈士忠诚于党、为国为民的家国情怀。邓恩铭投身革命后，再未回到故乡，对此他赋词明志：“长期浪迹在他方，决心肠，不还乡。为国为民，永朝永夕忙。要把时潮流好转，大改造，指新航。”刘谦初在写给妻子的遗书中说：“我现在临死之时，谨向最亲爱的母亲和亲爱的兄弟们告别，并向你紧握告别之手。望你不要为我悲伤，希你紧记住我的话：无论在任何条件下，都要好好爱护母亲！孝敬母亲！听母亲的话！”刘谦初把党比作亲爱的母亲，嘱咐身边的同志在任何时候都要爱护“母亲”，听“母亲”的话。

为了新中国——革命烈士纪念碑碑文敬读

党的忠实儿子刘谦初

□贾晓峰

谦初发表《“二七”四周年紀念告革命的民众》一文，他号召广大工人阶级；我们要更加彻底地反对帝国主义和军阀的压迫，使中国民众早登自由平等之城。

艰苦斗争的地下工作者

1927年1月，刘谦初加入中国共产党，找到了理想的指路明灯。在中央农民运动讲习所的开学典礼上，他聆听了毛泽东所作的关于农民运动的报告。之后，偕妻子张文秋拜访了毛泽东，深入探讨工农联合的问题，更加明确了革命的方向。

在福建革命严重受挫之际，1927年10月，刘谦初临危受命到福建漳州从事党组织的恢复整顿和发展工作。次年8月，在福建省第一次党代表大会上，当选中共福建省委书记。处于革命低潮的福建，物质条件相当困难。吃穿用度极其简陋，吃糙米饭，有时三餐也难以保证，在寒冷冬日仅凭破衣御寒。就是在这种艰苦的条件下，刘谦初和战友们夜以继日地从事党组织的恢复、发展工作。他还非常注重党员的政治理论学习，尽可能通过座谈会、训练班等形式组织党员学习，主持创办福建省委机关刊物《烈

火》，指导福建党的工作的开展。

视党为最崇高可敬的母亲

1929年2月，刘谦初根据中央指示，化名“黄伯襄”，以齐鲁大学代课教员的身份为掩护，赴山东执行恢复党组织、筹建省委等任务。4月份，新的山东省委成立，刘谦初任省委书记兼宣传部部长。白色恐怖之下，刘谦初常常冒着生命危险，来往于济南、淄博、青岛等地，深入群众指导工农运动，帮助建立基层党组织，使山东党组织迅速得到恢复和发展。1929年6月，他领导了著名的胶济铁路总同盟大罢工。由于叛徒出卖，新的省委又遭严重破坏，刘谦初和妻子张文秋先后被捕。

在狱中，面对敌人的利诱和严刑拷打，刘谦初坚贞不屈，对党的机密守口如瓶，忠诚捍卫党的利益，他还写诗鼓励妻子：“无事不必苦与愁，应把真理细探求。只要武器握在手，可把细水变洪流。”在狱中，刘谦初从未停止对敌斗争，带领大家成立狱中党支部，和邓恩铭等共产党员一起积极、谨慎地开展大量的秘密工作。组织狱中同志学习马列著作，把“监

狱当学校，法庭变讲坛”。1931年4月5日凌晨，刘谦初与邓恩铭等22名共产党员英勇就义，刘谦初给妻子留下一封题为《爱护母亲！孝敬母亲！听母亲的话！》的告别遗书，将党视为最为崇高可敬的母亲，而把自己看作党的忠实儿子。

周恩来得知刘谦初被捕的消息，沉痛地说：“谦初是党的好干部，他像猛虎关入囚笼，无法施展威力，这是党的损失，应当通知互救会，继续想办法营救。”刘谦初不幸牺牲后，上海党中央机关在周恩来的主持下，为刘谦初等烈士召开了秘密追悼会。周恩来怀着沉痛的心情号召大家：“谦初的斗争意志很坚强，值得同志们学习！”1938年7月，毛泽东在延安中央党校礼堂接见他的遗属张文秋时说：“刘谦初我是知道的，他是一个好同志，可惜牺牲得太早了。”并认刘谦初的女儿刘思齐为干女儿。1946年，从国民党监狱获救的刘思齐回到延安，和从苏联回国的毛岸英相识相爱，并在毛泽东的主持下，于开国大典之后成婚，成为一段佳话。